

毛泽东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官力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战略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开始处于不利态势,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并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而苏联锋芒毕露,急剧扩张,对中国构成很大威胁。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中美关系,逐渐形成利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战略设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展现出非凡的洞察力和决断力,与美国政治家尼克松一起,打开了尘封已久的中美关系大门,由此形成了国际关系的新格局。这是20世纪外交史上最重要的外交突破之一。

一、敏锐把握时机

1969年4月,“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混乱刚过,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至此,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反常情况终于结束。此后,毛泽东就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但中央政治局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均需请示他,并经他批准后才能实施。在中美关系解冻期间,中国的外交决策程序如下。

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部门、新华社以及军方分别向中央及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报送外交和军事动态(重点是美国和苏联)的分析意见和建议,以及有关国际形势、美中苏关系的内部参考材料、外电报道,供决策参考。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战略上把握对外关系的大政方针,批阅有关政策的重要文件,经周恩来组织落实其外交战略部署。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

中央政治局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一些决定,但需得到毛泽东的最后批准。在调整对外战略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曾多次召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制定有关政策和策略,并将结果上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批阅。毛泽东对此积极过问,并有大量重要批示。林彪主管军队不主管外交,对此很少有具体批示。毛泽东做出缓和中美关系的决策是一个层层递进和对问题反复认识的过程,在此期间,毛泽东最先注意到,尼克松于1967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①毛泽东阅后认为,尼克松的动向值得注意。^②

尼克松上台后,在就职演说中再次针对中国提到:“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在这个世界中,任何民族,不论大小,都不会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我们不能指望

* 本文系国家开发银行资助中共中央党校2010年度校级重点项目“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研究”(000129)之阶段性成果。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① 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 1, 1967, pp. 111-125.

② 周恩来在1974年12月12日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时说:“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一九六八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基辛格博士说了句公道话。他说,打开大门的,在美方来说还是尼克松下的决心。当然,在发展中美关系中的贡献,基辛格也是有一功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85页)

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可是我们能设法使任何人都不与我们为敌。”^①毛泽东理解了美方传递的信息，就此评论说：“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②

1969年3月，由于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认为已是大敌当前。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后，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与，“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并将意见上报中央。在此后的多次讨论中，四位老帅认为，在目前中、美、苏三方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在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首都机场会晤之后，四位老帅认为，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毅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③四位老帅的真知灼见，与毛泽东不谋而和，促使他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后来，陈毅曾感慨地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④

二、因势利导，独创乒乓外交

从1969年开始，中美两国小心翼翼地进行了试探，相互传递的信号由弱渐强，逐步明朗，相互信任有所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外交接触已势在必行，美国人急起直追利用华沙外交场合向中方传达了改善关系的信号。

在此情况下，经毛泽东批准，中方邀请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于1969年12月11日来中国大使馆。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虽然不是正式会晤，却决定两国关系的走向。美方提出正式恢复两国间大使级会谈建议，中国代办雷阳表示马上向国内报告。第二天，周恩来将外交部转来的会见材料报送毛泽东，并批注：“‘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毛泽东批：‘照办。’”^⑤随后，经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正式商定，将在北京举行更高级别的谈判，讨论中美间的重大问题。但是，紧要关头，印度支那风云突变，美国出兵柬埔寨，打断了中美接触的势头。1970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鉴于目前形势，需再次推迟中美大使级会谈。

不久，毛泽东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信号。他此时正在思考如何利用斯诺访华来打开局面。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斯诺，并与他站在一起检阅了国庆游行队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斯诺是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人。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并有意向他探询：“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毛泽东

①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0, January 20, 1969, 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For sale by the Supt. of Docs., U.S. G.P.O., 1971, pp.1-4.*

② 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第312页。

③ 关于四位老帅讨论的细节，参见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173—204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884—885页。

④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8页。

又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①这番话的意图是：“我现在就是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②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黄华负责审编毛泽东和斯诺会谈纪要，并作为正式文件发至全党和全国各基层单位。12月25日，在毛泽东77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会见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的消息。^③但是，毛泽东对美方做出反应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一点。事隔多年之后，基辛格回忆到：“毛泽东主席曾经通过斯诺向我们传达信息说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当时我们怀疑斯诺传达的信息不可靠，不敢贸然采取行动。没想到，1971年4月中国方面大胆地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去中国访问，原来中国领导人的战略考虑与我们有相似之处。”^④

1971年3月末，在日本开幕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给中美关系缓和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在名古屋，中美乒乓球代表团官员和运动员的接触逐渐增多，美国队在兴奋之余，明确地表达了希望访华的意愿。

历史性的机遇稍纵即逝。4月6日晚，经过多方面的权衡、比较，毛泽东否定了相关部门“暂不邀请”的决定，发出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指示。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对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⑤美国白宫对此立即做出积极的反应，宣布撤销对华的一系列制裁和限制。中美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转机。

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商讨中美关系问题。会后，周恩来于27日致信毛泽东指出：“二十六日晚上政治局会议已开过，大家发表了一些意见。我将写出带方案性的报告，经大家审议后，再送主席、林副主席考虑。”毛泽东在“经大家审议后”一语下面划了横线，并写了一个批语：“这样好。”^⑥毛泽东于29日审阅《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并批示同意。与此同时，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发给尼克松口信，口信表示：“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提前来华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做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⑦至此中国决策层确立了新的对美政策和方针。

6月4日，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渠道回了口信，表示感谢中国方面欢迎他访华，并具体建议基辛格于7月9日到达北京。6月11日，中方回口信表示同意这一日期。1971年7月9日，中国方面如约在北京接待了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7月15日双方发表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公告。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始融化。

三、掀开中美关系新篇章

经过充分准备，中方确定了尼克松总统访华接待工作的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92—593页。

② 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第299页。

③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

④ 《基辛格在纪念乒乓外交2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转引自周锡生：《“乒乓外交”历久弥新》，《瞭望》周刊1997年第33期。

⑤ 周恩来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谈话，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74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34页。

⑦ 口信引自《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附件，参见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7页。

之以礼，不强加于人。”^① 在尼克松临行的前两天，基辛格以备忘录形式向总统建言：“中国人在讨论各种问题时，会关注你的战略观念。他们将希望知道你是否理解他们的观点、我们如何制定未来的行动计划，以及是否可以信赖我们坚定不移地推动前进。”总之，最根本的是要表现出“我们审慎之至，理解世界运行之原动力，并且信守承诺”。^②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欢迎仪式是低调的，没有鸣响礼炮，没有外交使团出席，没有欢迎的群众。在中美两国国歌的演奏声中，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当天下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并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可是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③

毛泽东的话意在说明，既然中美之间没有相互打仗的可能，因此，应当排除障碍，改善关系。在毛泽东和尼克松为中美新关系定下基调之后，周恩来和尼克松及基辛格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在此期间，毛泽东听取情况汇报，并及时作出指示。

2月28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方则声称：“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④ 美方这一立场是在两国交往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为下一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始终把中美关系看作是中国对外关系链条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并且对中美关系充满信心。同美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相互间的关系是毛泽东多年的宿愿，也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之一。历经艰难曲折，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成为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画龙点睛之笔。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在确定中美关系的大政方针，以及做出重要的外交决策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调整对美方针的最初设想不是自下而上（先由外交及政策研究部门提出），而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即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有了初步想法，然后让有关部门探索可行性。毛泽东是中方决策的核心人物。周恩来和外交部、军方、新华社等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参考材料，对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做出重大决策亦有相当的影响力，如周恩来关于中国乒乓球队应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报告；外交部关于美军侵略柬埔寨中国应推迟中美会谈，毛泽东主席应发表声明的建议（5·20声明亦由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为毛起草，经毛审定、批准发表）；军委四位副主席关于国际局势的分析意见（其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协助安排讨论的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后来还直接参与了中美会谈）；乒乓外交期间新华社向毛提供的外电报道，各方反应等参考材料（其中最为详尽的是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对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下最后的决

① 周恩来同参加接待尼克松来华准备工作会议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1971年12月2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04页。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Subject: Mao, Chou and the Chinese Litmus Test,” *FRUS, 1969-1976*, vol. XVII, pp. 673, 677.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页。

④ 中美《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心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决策层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是缓和中美关系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不是独立于中央政治局之外，而是在中央政治局内发挥主导作用。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毛泽东侧重于战略规划，周恩来侧重于具体指挥和实际操作。

在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下，中国通过缓和中美关系，改变了当时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形成国际战略力量“大三角”的局面，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但这一决策在中苏、中越、中阿（阿尔巴尼亚）关系方面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许是中国为了实现当时的主要目标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虽然毛泽东生前没有看到中美正式建交，但他所确立的对美政策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西方世界一种新的观念，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来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由此对中国外交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并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巨大促进作用。在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之后，中国开始迎来一个全新的外交局面。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到现在没跟美国缔结什么协议，只有一个《联合公报》。但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①

当1976年毛泽东与世长辞之时，中国不仅打开了沉重的对美关系之门，并且以此为突破口，结束了同西方发达国家隔绝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晚年以巨大魄力领导实施了对美政策的重大转折，为中国新时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与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陈 述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他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力图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一、重视中共党史研究

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高度重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为提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毛泽东通过颁布指示等，积极推动全党全军进行中共党史和军史的研究。1931年4月17日，毛泽东等签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其工作内容是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②1937年5月10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十周年，毛泽东、朱德发出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1941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强调：“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可以说，延安时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共党史学科的形成时期，更是通过中共党史研究，判断历史是非、理论是非，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确

^① 周恩来与金日成会谈记录，1972年8月24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第1110页。

^②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0页。